

纪念

长白山的孩子

——祭胡冬林 于晓威

5月4日上午，青年节，我正在抚顺等地参加全国多民族作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采风行”活动途中，手机突然接到朋友短信：胡冬林兄早晨走了！

尽管近年来，我身边熟悉的作家朋友接连三地早逝，我接连三地应约为他们写怀念文章、主持追悼会，甚至中间也包括我父亲的离世，一次次让我感到锥心疼痛，感叹人生无常，已庶几令我心生钝感，愿做掩耳盗铃和麻木自欺的僵尸，但是，听到冬林兄猝然去世的噩耗，还是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忧伤的回忆……

我与冬林兄早些年并不熟悉。2004年我们同读鲁迅文学院第四届全国高研班，方结下十多年来的友谊。记得刚开学不久，就听说他是知名满族老作家胡昭的儿子，我虽未见过胡昭，但是在我曾经主编的《满族文学》杂志上，胡昭的名字是一直醒目地印在每期刊物顾问名单里的，直到他去世。不过我的性格是很少主动去接触我“心仪”的人，倒是胡冬林，有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我打起了招呼：“你是于晓威吧？我叫胡冬林，吉林的，我也是满族。”

说实话，刚开始接触几天，我并不太接受他。一是目测我们大概有代沟，二是他的模样，虽然戴着眼镜，但是说话做事并不像个文人，衣着打扮也很随意，显得有点吊儿郎当。我见过胡昭的照片，英俊文雅，这哪能和我心目中的胡昭的儿子相叠印呢？

因为他经常熬夜，也就经常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同窗好友去他宿舍里喝茶聊天。他烟抽得很凶，偶尔咳嗽，只不大一会儿，房间里就会弥漫着腾腾的烟雾。他经常会从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搜寻到一些水果给我们吃。他跟我们聊文学，聊生活，聊一些他所感到快乐的事。聊着聊着，他就会聊到森林里的事，聊到野猪，聊到兔子，聊到鸟，而且聊的密度之大，神态之投入，心情之忘我，让人吃惊。多半是，我深夜已很深，借口还要赶稿，先退回我的房间了事。但是他不介意，下次闲时，还是会把电话打到我的宿舍里，邀我去他那里坐。

我慢慢知道他是写自然和生态题材的了。因为他待我为族弟，近我无芥蒂，我好几次想跟他说，既然他很早就做过刊物的小说编辑，又出身作家之家，为什么不从事“严肃”小说的写作而去搞什么自然和生态写作呢？实在是浪费才华。但是每当一次又一次，他将他的那些容不得我插嘴的关于无数神奇的野生动物的故事灌进我耳朵时，我只有投降了事。

业余时间他喜欢打乒乓球。这倒对我胃口。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长得粗壮，爆发力强，每次赢了一个球时，他都会像个孩子似的，转个圈，仰天大笑，那笑声也极具爆发力，简直可以从一楼的门厅处抵达三楼任何一个房间。可以说，他的笑声是极具感染力的。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诫我，



胡冬林

走上社会，看一个男人是否值得交往，主要是看他生活中习惯喊喊而笑，还是酣畅大笑。大笑者，大诚也。

果然冬林兄非常真诚和率性。每次众人散步或聚在他房间聊天时，话题扯到身边小人及社会不平事，他都会高声大骂，毫不避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极少为一己之不公而私鸣怨声。事实上，我感觉他生活中有他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

我打乒乓球，贪玩无节制，经常是与几轮对手打到自己浑身瘫软，方才想起回房间写作。而冬林则不是，看得出他也非常爱打球，但是每次都是临下楼吃饭前那20分钟，逢上有空档，他才打打，或者是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有人在打，忍不住“加塞”一下，但是仅打两场，不管如何快乐，也要歇拍回房间写作。

鲁院学习期间，是冬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更多时候他是独来独往，常常是躲在房间里写东西。将近5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其间我爱人携我9岁的女儿来北京玩，冬林感情地请我们一家出去吃饭，席间很爱逗我女儿开心，还答应过后给我女儿邮寄他写的书。

学习结束，我和冬林各奔前程。倒也没有依依不舍，因为同在东北，又知道彼此同在文坛厮混，再次见面当然可期。

回去不久，有一天，我果然接到冬林寄来他出版的两本书。信封是写我的名字，可是书的扉页，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并且还附满了许多对她祝愿的话。仅仅一面之谋，他一不食言，二竟能记住我年幼小女儿的名字，可见他是多么善良而有心啊！

果然在毕业后的多年里，我们又在几次活动中见面。只不过每次见面，他都行色匆匆，甚至提前离开。他跟我说过这些年，他一个人去了长白山，在那里有一个住处，每天除了观察森林和其间的各种物种，就是写作。我感到他对此更加痴迷了，那无疑是

他内心格外充实的表现，所以非常为他高兴。

时光倏忽而过。2012年的某一天，我打开电脑，忽然发现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新闻首页，均出现了报道长白山发生五头野生熊被人取胆盗杀的事件，文中详细取证和介绍了此一悲惨事件发生的过程，并配有图片，作者呼吁社会要立刻予以关注。文章是胡冬林写的。我一直在网上关注事情发展，直到案件侦破，心为之宽慰的同时，也深深服膺冬林的义举和可贵的时代人文情怀。

后来再见面，我跟他聊起此事，并嘱他多注意安全，他似乎不屑跟我炫耀这些以往的成绩，只是比较忧心地说，长白山森林环境和动物生态仍不乐观。

而那时候，我已从鲁院毕业快8年，这8年里我的文学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这不是我的变化而是社会在变化，我觉得我曾经不理解的冬林的创作姿态和价值取向，一点点变成了我向他靠近。而他，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如一日啊，可见他的文学介入现实的自觉性早就形成了。

冬林非常佩服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他多次在记者采访中提到了它。而我记得，就他心性而言，虽然他远没有下面将要提到的这些人伟大，但是他集合了达尔文写植物、法布尔写昆虫、梭罗写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写生态环境于一体的热情之大成者，这一点他毫不逊色。同时，他在国内的当下环境，20多年孤军奋战，文章运笔和哲学体悟形成独特的个体特色，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现实领域来说，实在是江入荒流，殊可称道。

冬林其实不愿意外界称其作品为自然文学，称其个人为大自然作家，他愿意自己成为一个生态作家。这不仅是对蕾切尔·卡逊表示某种精神衣钵的尊重，更是他厌倦讴歌赞美、深人体察忧患的象征。我觉得“生态”二字，在他那里，不仅是关于自然的“生长态势”之义，而更是对这个深情的世界，采取何样的“生命态度”问题，这才是他的“生态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冬林兄的猝然离去，不同于我以前的低落和悲伤，我从他的离去感到了他的一种豪迈。因为我这两天总是这样想，假如上帝对他讲，赤子！啊，孩子！你对这个世界和大自然的物种的热爱，以及你的任务，业已完成，一切从此均好，你可以放心了。如果上帝有此诺言，我想，冬林是不会犹豫他的生命去留的。

冬林兄，你安息吧！



生活质感

冬日去广东清远躲霾，粤北山区仍是一片葱茏的景色。我和几个也已退休的朋友惬意地泡温泉，发现形态各异的一个个温泉池，是连通着旁边的一座大湖的。温泉湖水的浮力，使人很轻松地可以在水面漂浮。我不得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收获》，主人翁赞颂他们欣欣向荣的集体农庄时说，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关键时候托住你，不让你沉沦；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信任你、给你施展才华的平台。

不沉的湖，是对一个集体的赞美。退休了，离开了集体，对这个“湖”倒有了一些感悟。按说退休后完全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而于我，最大的知足是卸下了担子，也就远离了责任，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了。何以叫“担惊受怕”？是与我供职的单位性质有关——我所在的集体是一家党报。我经常在回家的路上被报社办公室一个电话追回；而主管我的一位总编辑来电话，第一句常是严肃地问：“你在哪里？”朋友不解地问，你这么受“折磨”，干吗不“跳槽”啊？我说，容我给你们讲几件小事儿，也谈谈我30多年来感悟到的这座“不沉的湖”的一些细枝末节吧。

1982年大学毕业，我很不情愿地被分配到北京日报社。报到时，很诧异这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那张北京地方报纸，因为我最先接触到的两位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那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一般要先去总编室上一年夜班。带我的要闻版编辑庄兴昌、徐炳炎两位老师，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兢兢业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每当长夜即逝的黎明时分，夜班编辑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下清样前“唱稿”（把一版从报头的天气预报一直念到最后一个字）时，两位编辑不知不觉就有“依偎”的上海话出来了。再加上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唐纪宇同志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真让我这个北京小伙子不知身在何处。一年的夜班工作结束后，我去见一位白班副主任朱大姐，她一开口也是“阿拉阿拉”的。我想，包容，就是报社的一种文化。我们虽是地方报纸，却海纳百川，广纳贤士。至今，我们报社年轻的总编辑是南方人，有位副总编辑是安徽人，说不好普通话。

其实，我在1975年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时我在京郊农村插队当知青，给我改稿编辑的报社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从1975年到我考上大学，再到1982年毕业来到报社，这六七年中，我和老方有过大量通信。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色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有关工作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信封、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有时友人聊天，常听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事在我们报社行不通。我真的信任我的报社、我的上级。是不是我在报社工作一直很顺呢？恰恰不是。某一年，我的事业跌到了谷底，从一线记者、亚运会报道组组长的位子，一下调到夜班班检查员（比较对高一，算编辑部编制）。我万念俱灰地来到夜班班报到，让我没想到的是安排给我的办公室仍是两人一间的。我听到有人去责问总编室主任，主任一点不客气，说：你们能和李培禹比吗？这已经够委屈他了。就在上夜班期间，我编著了《走进焦裕禄世界》一书。出版社要搞个首发式，提出报社能不能来一位领导出席，我十分犹豫地找到社长满运来，他说，我去。满社长不但参加了首发式，还细心地通知总编室、新华社关于首发式的消息可用。满社长后调任市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多年，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一当面就说不出口了。

我们报社的职工一直令我敬重，其实他们都是报纸的第一读者。我有时写了比较好的稿件，他们会不吝溢美之词，给你很大鼓励。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的大白话充满了温暖。有一个时期我不写稿了，心情灰溜溜的。一次，复印室一位大姐见到我，问：你怎么不来这儿复印资料啊？别人都复印呢，申报高级职称啊！我不费那劲了，我没戏。她大声对我说：你没戏谁有戏？你在报社那么多年，我们都看着呢。你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复印。

这话，大姐可能早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说到申报高级职称，还有个插曲：我填表时有一项是报社领导意见，我的心有点凉，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主管我的总编辑严力强因为工作刚吵了一架，双方都红了脸。几天后当我从职称办取回申报表，打开一看，领导意见一栏写得满满的，是他“力挺”我的一段高度评价，全然没有一点个人恩怨。后来，力强调任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我们很少见面了。那年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得了中国新闻奖，我接到他的短信：“培禹：祝贺你，谢谢你！”“祝贺”是给我的，“谢谢”是他站在领导的高度对我为报社、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肯定，他是我的知音。

后来，我来到“秋天的团泊洼”，领取全国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说实话，在此之前，报社领导通知我我参评这个奖时，我没有推辞，因为我真的愿意得到这个以孙犁名字命名的奖。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奖不是奖给个人的，是奖给获奖者所在的部门的，再往大点说，这个奖是对整个报社重视副刊、办好副刊的一个褒奖。我为我供职的报社拿回了这个奖，心里很欣慰。

该说说大集体中的小集体了——我所在的报社副刊部。有一年春节，报社举办团拜会，编辑部各部门都有一段自拍视频播放给社领导看。有些部门做足了功课，总之要把成绩说够。我问几位编辑怎么拍？大家纷纷说当然是办好副刊啦！于是，我们副刊部9个人排成一排，分别举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优秀会员单位”金牌和各种获奖证书，齐声高喊的是：“稿费太低，太低！太低！实在是低！”

人总要老的。终于退休了，一阵轻松，也有点难舍，但我还是当晚悄悄退出了我们部门的“微信群”。不想，我又被拉了进去。再退，又被拉回。副主任戎戎留言：“老培大哥不能走哇！”美女编辑赵耕说：“别走，每次给大家带我爸腌的咸菜，都有您一份儿啊！”

哦，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我庆幸在这样的“湖”里劳作过、失误过、贡献过。至今，我还感受着她的温度。

不沉的湖

□李培禹



原上草 第298期

Advertisement for 'Red Rock' magazine, featuring 'Stars' section and editorial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Shiyou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Novel Zone' and 'Poetry Flow' sections.

Advertisement for 'Guangxi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Novel Special Features' and 'Poetry Green Wind' sections.

Advertisement for 'Red Rock' magazine, featuring 'Chinese Narrative' and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 sections.